

---

# 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瓦解敌军工作

周晓东

---

瓦解敌军工作是共产党军队的传统之一。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瓦解敌军工作经历了八年的磨炼,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经验,理论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连素以“不可战胜”自居的日军也不得不为之胆颤。在劣势对优势、以弱小对强大的八年抗战中,瓦解敌军工作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以下探讨。

## 一 中共瓦解敌军的策略方针

瓦解敌军,在中国古代就受到许多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孙子说:“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国共产党瓦解敌军的策略方针就是吸收这种传统的兵家思想,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中共建军初时,就提出并执行了对敌宣传、善俘、释俘的政策。但确立瓦解敌军策略方针的显要地位,并赋予其丰富内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以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第一次把瓦解敌军工作摆到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的显要地位。他甚至说:“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

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sup>①</sup>这是因为：“一个顽强的敌人，要能够打破他与消灭他，这是需要耗费很大的军事力量的。然而，一旦它在政治上失掉了灵魂，精神上解除了武装的时候，那就会成为容易打破与消灭的敌人了。”<sup>②</sup>毛泽东在抗战初期还预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sup>③</sup>罗瑞卿等人也曾论述：“瓦解日本军队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胜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不但要求在军事上去粉碎敌人，而且必须依靠在政治上去瓦解敌人。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尚有待于我们这两个方面之最好的配合啊！”<sup>④</sup>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抗战胜利的八年中，中共及其军队在敌军工作方面共发各类文件数百件，仅《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战卷收录的专门文件就有102篇。可见，瓦解敌军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受到了极端重视。

瓦解敌军工作也是中共及其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1937年11月26日，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以为革命政治工作应分为军队、居民、敌军三方面的工作。”<sup>⑤</sup>罗瑞卿在《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也把政治工作分为三方面。认为“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总的最基本的任务，即在于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团结千百万人民于自己的周围，协同军队作战，从政治上影响敌军内部，瓦解敌人的军队，从此三个方面任务之彻底完成以实现战争总的胜利之全部达到”。<sup>⑥</sup>在国民

---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册：第2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79页。

④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300—301页。

⑤ 同上书，第46页。

⑥ 同上书，第184页。

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sup>①</sup>、《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中,都明确规定瓦解敌军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sup>②</sup>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 发刊词》中指出:“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sup>③</sup>1940年7月,总政治部给一二九师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信指出:“在战争目前的阶段上,开展敌伪军工作,使其能够获得应有的成绩,已成为我们目前的中心工作。”<sup>④</sup>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又指出:“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是目前敌后三大中心工作之一。”<sup>⑤</sup>1942年1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敌军工作是反攻的先锋”。<sup>⑥</sup>同年7月,陈毅在盐阜区敌工会上说:“敌军工作是战略反攻的准备工作的中心任务。”<sup>⑦</sup>

由上可见,瓦解敌军工作在抗日战争的政治工作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抗战八年,既是军事斗争的八年,也是政治斗争的八年,瓦解敌军的八年。

但是应该指出,瓦解敌军工作,做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它的实施有很大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军官兵军国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从明治政府建立开始,日本就公然推行“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武力为立国之基础”、“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sup>⑧</sup>等露骨的军国主义路线,对全国军队、群众和学生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灌输“忠君爱国”、“献身天皇”、“克忠克孝”等思想。人们都以被征入伍、出征参战、为国牺牲为光荣。军队中经常要举行朝敬皇像,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326页。

② 同上书,第438页。

③ 同上书,第344页。

④ 同上书,第2册,第235页。

⑤ 同上书,第4册,第299页。

⑥ 同上书,第5页。

⑦ 同上书,第304页。

⑧ 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遥拜皇城,奉读诏书,精神训话等活动。军人视被俘为最大耻辱,坚守“与其活着受囚虏之辱,不如战死做护国之神”<sup>①</sup>的戒律,所以许多士兵临死时还高呼“天皇万岁”。

在政治宣传方面,日军把对华侵略解释为实行日本精神,解放被压迫民族,建立“大亚细亚新秩序”的“王道东土”;发扬皇威于海外的正义“圣战”;把中华民族描绘成下贱、野蛮的劣等民族,而把自己大和民族鼓吹成独得天佑的最优秀的天之骄子;把我军宽待俘虏说成是抠心杀头的前奏,恐吓士兵俘虏不得转生轮回等,诱使官兵产生仇视恐俘心理。

第二,异民族诸因素的阻隔。对异民族军队的瓦解存在着语言不通,习惯不同,风俗不懂,心理不融等障碍,影响了对敌喊话、标语宣传、打入策反等手段的运用。

第三,敌我军力的悬殊。瓦解敌军是军事斗争的辅助手段。需要有一定的军事优势才能得以实施和收效。而抗日战争中我军在兵力、兵器等方面长期处于不利状态。因此,彭德怀在《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中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尤其是敌人在军事上还有优势的时候。”<sup>②</sup>

第四,友军的消极影响。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重视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对俘虏不重视、不善待、任意杀戮、弃之不管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发生排斥、驱逐反战同盟盟员的事件。美国外交官约翰·艾默逊1945年1月参观了国民党在重庆的日俘收容所后说:“这与在延安那些快快活活的日人相比,真是鲜明的对照。”<sup>③</sup>1937年10月6日,八路军《总政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也指出:华军“以残暴手段对付俘虏,也是使敌临死不缴枪的重要原因。”<sup>④</sup>

① 香川孝志,前田光繁著,赵安博等译:《八路军内的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②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110页。

③ 香川孝志,前田光繁著,赵安博等译:《八路军内日本兵》,第84页。

④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4页。

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我军瓦解敌军史上空前的困难。从1937年7月到1939年5月,无一日军投诚,可见瓦解敌军工作的艰巨程度。针对上述情况,中共在确立瓦解敌军策略原则的同时,还制订了一些具体的方针办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 (一) 多方投入,形成群众运动。

1. 军队人人参与瓦解敌军的工作。1937年10月6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发出的第一个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中,就明确要求发动官兵参加瓦解敌军工作。为此,全军广泛进行了教育,使全体官兵懂得对敌工作的重要性,保证自觉遵守敌军工作的政治纪律。为适应形势需要,抗大及其分校和各部队教导队都设立了敌军工作干部训练队。到1939年10月,八路军共开办训练班20次<sup>①</sup>,积极开展教学日语口号、歌曲活动。如平型关战役后,部队普遍学习“不杀日军俘虏”、“优待日军俘虏”、“医治日军俘虏”等三句日语口号。毛泽东同志也在《论新阶段》中号召:“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与恰当内容的日本话……从学几句话起到能够同日军官兵讲一篇道理为止。”<sup>②</sup>广大官兵除在火线上进行喊话外,还开展捉俘虏比赛。三八五旅在百团大战中开展捉俘虏比赛就俘获日军29名。抗战两年不到,“部队中敌伪军工作已造成相当高度的一种热潮,使这一工作开始走向群众运动”。<sup>③</sup>

2. 社会处处都有瓦解敌军的力量。瓦解敌军工作一开始,八路军总政治部就明确了应发动组织和指导群众进行瓦解敌军的指导思想。《敌军政治工作纲要》也指出:“我们要动员广大群众来参加困敌、扰敌和对敌宣传等等,瓦解与争取敌人的工作。”<sup>④</sup>在中共号召下,无论是敌占区、游击区,男女老幼都为瓦解敌军做了大量工作。山东军区某部武装宣传队把从墙上铲下的宣传品,让老乡用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593页。

② 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③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414页。

④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150页。

筐挑到敌营去,达到宣传的目的。<sup>①</sup>还有的部队利用敌军官兵喜欢小孩的特点,让小孩“捡”传单,送给“皇军”观看。为保护俘虏西村,冀中“郭大娘被敌人用刺刀刺伤了大腿,被打得几乎断了气。她仍按照党的指示,一直坚持守候着西村”。<sup>②</sup>一些伪军的家属也都参加瓦解工作,为瓦解伪军起到较大作用。

3. 吸收日人加入瓦解敌军的行列。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谎言的戳穿,在华日本革命志士、觉悟了的日本官兵和日俘,纷纷举起反战的旗帜,加入瓦解日军的行列。他们先后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反法西斯进步团体,实行革命的败北主义,掉转枪口对对准日本法西斯,展开有组织的反战斗争,动摇日军的军心。杉本一夫、野坂参三、鹿地亘、香川孝志、绿川英子等等都是杰出的反战战士。无论是华北、华中还是华南,无论是敌军内部还是敌后战场,都有他们工作的影子。在延安工农学校的反战战士就有300余人。“1945年7月,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达到1000多名,其中还不包括许多参加了各项抗日工作的觉悟了的日本士兵”。<sup>③</sup>

## (二) 针对不同情况,制订不同政策。

适应各种情况的变化,针对性地做好工作,是提高瓦解敌军工作实效的关键。1937年8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提出:要“估计到敌人对象之不同,作战地区的作战方式的差异,要求我们对本军、敌军和居民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加以很好的研究和适时的转变”。<sup>④</sup>

1. 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抗日战争中的敌军有着复杂的成分,既有日本兵,也有受其胁迫的朝鲜、台湾附庸兵,还有大批伪军。伪军又分“满洲”兵、内蒙兵和当地伪军。因此瓦解时方

① 姜思毅:《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2卷,第241页。

② 香川孝志,前田光繁著,赵安博等译:《八路军内的日本兵》,第64页。

③ 王庭岳著:《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第309页。

④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14页。

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对日军官兵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解除其思想上的敌视态度,煽动厌战情绪,挑起日军内部矛盾。中心口号是:“日本军阀是日华人民的共同敌人”、“优待日本俘虏”、“回国去,为日本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而斗争!”对伪军则是争取、分化与瓦解和策略并用。即争取最大多数伪军反正,依据其内部矛盾分化,孤立铁杆汉奸部队。中心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当日本兵,不打自己人”、“各民族联合起来,抗战胜利必属于中国。”

2. 针对不同的场合采取不同的方式。敌军驻扎时,主要采取河漂、“孔明灯”、潜入等方式进行宣传;敌军进攻时,在预计敌军经过的区域或到达的居民地,贴写传单、标语;敌军防御或被包围时,主要采取喊话、唱歌以及利用弓箭、石块、日用品、慰问袋等夹带宣传品、通行证、劝降书、优待券、思乡物等形式;敌军俘虏时,开欢迎会、发宣传品、上教育课、答俘虏问;敌军死亡时,还送尸体或建墓标、写碑文。墓标上书写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埋葬年月日。碑文上用日语写上鼓动厌战情绪的话,如“停止战争回去吧!”“告诉地下战友家属,八路军郑重地埋葬了他”等等。

3. 针对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宣传内容。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消除民族偏见,揭露日本军阀、财阀与工农的矛盾;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煽动思乡情绪,鼓励下级官兵厌战、反战;战略反攻阶段主要宣传俘虏政策,扩大投降、投诚、反正成果。我军还利用新旧年关、樱花节、端午节等日本民族节日,敌伪军内部各种事件,我军及国际反法西斯战场胜利等各种名目,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敌伪军开展瓦解工作。

## 二 中共瓦解敌军的实践及经验

中共在八年抗战中瓦解敌军的工作,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分别发表《告日本海陆空军宣言》、《告日本士兵书》,至1939年10月2日八

路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敌伪军工作的训令》。这一阶段为起步阶段。各部队都依据以往的经验开展了一些敌军工作,但由于抗战初期,敌军锐气未减,再加上我军一些部队在对敌宣传上内容政治化、公式化、平淡化,提出一些脱离敌军官兵觉悟程度的要求和口号,宣传方法上呆板,缺乏技巧和艺术,“收效尚未显著”。但不是没有效果。敌军从至死不降开始犹豫动摇,从“支那野蛮”、八路“挖心喂狗”,转而开始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俘虏人数也从平型关战役的零数,突破到500余人。1939年2月,日军榆次师团司令部副官会议上某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承认:“因为华军的反战宣传,总觉得士兵的思想似乎起了动摇,实在难于指挥。”<sup>①</sup>

第二阶段从1939年10月2日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阶段为调整阶段。针对第一阶段的情况,中共在《关于敌伪军工作的训令》、《关于对敌伪军宣传工作的指示》和《对日宣传标语口号》中,先后总结教训,调整瓦解敌军工作的内容和目标,指出:“根据日军的现状,我们对敌军工作方针与直接目的不应过高。如与日军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堡垒,希望日军大批哗变与大批投入华军等等,这是我们的远大目的,但在今天尚不可能,尚不是实际,须经过种种阶段才能达到。”<sup>②</sup>因此,我军废止了一些令敌军官兵反感的诸如“踏平三岛”、“杀尽东洋鬼”、“打倒天皇”、“打到东京去”等口号,提出迎合士兵情绪,贴近官兵利益的宣传内容。同时制订出一些敌军工作条例和敌工人员守则,进一步明确了有关敌军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样,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逐步纠正了过去的偏差。使战斗中的日军俘虏和自动投诚的数目逐渐增多。1940年秋开始的百团大战,仅第一二九师就俘虏日军近百名。这一阶段,向我军主动投诚的日军士兵有31名。<sup>③</sup>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第300页。

②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292—295页。

③ 张廷贵等著:《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4页。



第三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3年3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前线》报上发表《把日军工作提高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敌伪军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这一阶段是成熟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抓住这一时机，连续发出了《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应采取的政策指示》和《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伪及敌占区人民的宣传与工作指示》，全面开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动员党政军民各种力量，采用形式多样、内容生动的宣传，向敌伪反复发动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引起敌军的强烈反响，逃跑、投诚现象经常发生。据晋冀鲁豫区统计：1941年一年俘虏日军13人，1943年俘虏日军18人，投诚6人。冀南军区在1943年1至4月的政治攻势中，俘虏日军24人，投诚2人，逃跑24人。<sup>①</sup>政治攻势被人们称为第二条战线的“百团大战”。这个期间，我军各部队都摸索了较成功的做法。陈毅、刘伯承、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纷纷撰文总结瓦解敌军的工作总验。罗瑞卿的两篇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军瓦解敌军的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律。1943年3月中共中央向全军下发了《关于敌军工作的经验》，指导全军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

第四阶段从罗瑞卿的两篇文章发表至抗战结束。这个阶段为高潮阶段。我军对敌政治攻势势头更猛，在华日人反战运动也更见成效。日军厌战、反战和失败情绪日益增长。据军事科学院抗战史编写组提供的统计数字，抗战第七年日军投诚数字比前两年投诚总和还多，第八年日军投诚数字是前四年投诚总和，伪军也纷纷倒戈反正。到1945年5月，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俘虏日军4057人，伪军316378人，日军投诚212人，伪军反正114597人；1945年6月到10月11日又俘虏日军2156人，伪军196555人，日军投诚534人，伪军反正69005人；八年抗战共俘虏日军6213人，

<sup>①</sup> 姜思毅：《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2卷，第246页。

伪军 512933 人, 日军投诚 746 人, 伪军反正 183632 人。<sup>①</sup>瓦解敌军工作, 强烈动摇了敌人军心, 削弱了敌军战斗力, 撕碎了“皇军不败”、“武运长久”的梦想。日本一史学者研究了这段历史后, 感慨地说: “日本在被美国的物质力量战败之前, 早已被中国的民主主义所战败。”<sup>②</sup>

中共瓦解敌军取得巨大成绩, 与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密切相关。这些成功经验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设立专门的机构, 强化瓦解敌军工作的组织领导。为了适应敌军成份复杂、思想顽固、军力强大、民族异差等新情况, 抗战一开始, 中共中央设立了敌军工作委员会。1937 年秋, 八路军总政治部设立敌工科(1940 年 6 月扩充为部, 下分敌、伪科, 附设日本问题研究会)。同年 10 月开始, 八路军从野战政治部到各级政治机关, 均设立了敌军工作部门。师为敌工部, 旅为敌工科, 团为敌工股, 连为敌工小组。新四军成立后, 也在各级作战单位建立了相应的敌军工作部门。<sup>③</sup>各根据地政权, 也建立了敌军工作网, 在县以上设立敌伪军工作委员会, 由地方社会部与军队敌工部等共同组织; 在接近敌伪军的地区设立敌伪军工作站; 在居民、敌据点或敌伪军中秘密设立敌伪军工作小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党、政、军、民相互交换情报, 研究决策, 布置任务, 培养干部, 统一领导。这些机构的设立, 为瓦解敌军工作创造了条件, 使瓦解敌军工作开展得更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和成效性。

2. 创立敌后武工队, 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在瓦解敌军的过程中,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前提, 政治斗争是军事斗争的补充, 有了军事斗争的政治斗争, 才能巩固和扩大政治斗争的成果; 有了政治斗争的军事斗争, 才能使军事斗争做好准备和具备条件, 保证军事斗争更容易达到目的。罗瑞卿在《敌伪军

① 张廷贵等著:《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 第 43—44 页。

② 《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19 页。

③ 姜思毅:《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 2 卷, 第 239 页。

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一文中说：“不把政治攻势与这些斗争相结合，那是失策的。”<sup>①</sup> 敌后武工队就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进行对敌瓦解、分化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其任务是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从政治上动摇敌人的军心；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敌区群众工作，发展敌后秘密武装；开展敌伪军组织的下层工作，打击敌人，铲除汉奸；掩护交通与进行经济战。武工队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军队与人民相结合的统一体，在瓦解敌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3. 开展宣传攻势，促使敌军厌战、怠战、反战。宣传攻势是瓦解敌军的重要任务。1938年底，罗瑞卿论述了宣传攻势的重要作用，他说：“对敌军的宣传鼓动，这是整个敌军工作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瓦解敌人一个最主要的手段”。“我们对于敌人宣传的直接目的，在于从政治上瓦解它与破坏它的战斗力量。因此，应当从宣传与鼓动的上面增长敌军士兵的动摇与不满的情绪，把敌军士兵同他的官长对立起来。”“在今天，我们应当紧紧抓着日军士兵生长着的厌战、反战及普遍的思乡、思家、思妻情绪，在他们面前，提出关于这方面最煽动的口号”。<sup>②</sup> 宣传攻势的效果是：可以澄清战争的真实性质，可以煽起日官兵的对立，可以扩大日官兵的不满和厌倦情绪，可以促进日官兵走上正义之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多次指示搞好宣传攻势工作，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标语、口号。抗战中，我军积极做好撒传单、写标语、送书刊、喊口号等工作。1939年3月舒同在《晋察冀军区部队最近政治工作概况》中总结说，两个月内，四个分区共写标语21370条，散发传单79000份，“凡是接近敌人的房屋、树林、厕所、室内外，差不多满布起来了，并相当带艺术化”。<sup>③</sup> 我军朴实真挚的宣传引起了日军士兵的兴趣，有的把标语抄在日记中，有的把传单寄回国内家中。这引起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第273页。

②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414页。

③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1册：第594页。

了日军上层的恐慌,广阳战斗后,天津日军司令部发言人曾在广播上宣传:“八路军在战场上用政治口号动摇皇军,今后皇军当以毒瓦斯报复之。”<sup>①</sup>

4. 发展革命两面派,分化伪军和伪组织。大量伪军和伪组织的出现是抗日战争中的特殊现象,它是日军为补充军力不足采取的以华制华政策的产物。由汉奸以及国民党投降分子等民族败类组织和指挥的汉奸队伍,是日军的爪牙和帮凶。但在伪军中除极少数甘愿为日寇卖命的外,大多数是被迫或被骗参加的,他们有要求抗日的一方面,也有不得已应付日军的一面。中共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制定了发展革命两面派的政策。主要做法有:一登记红黑点;二制订善恶录;三建立生死簿;四签订家属协议书;五开展死心汉奸检举;六颁发回头抗日证;七进行良心大检查。革命两面派政策的广泛运用,为伪军伪组织的最后倒戈反正做了准备,有效地达到了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孤立日寇的目的。

5. 建立日军内部的反战同盟,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对埃德加·斯诺说,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是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大条件之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为贯彻这一精神,我军积极支持在华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特别是在华进步日人,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1938年3月24日、4月9日、5月28日,八路军先后印发了《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反战口号》、《日本反侵略女战士池田幸子献给日本士兵的公开信》、《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呼诉于我祖国(日本)同胞》等传单,引起很大反响。为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还从善俘工作入手,严格执行俘虏政策,教育俘虏,改造俘虏。在最艰苦的时期,我军官兵宁可自己吃不饱,也把大米白面省给俘虏吃。许多部队对俘虏坚持开欢迎会、欢送会、发三块大洋(优待费)、吃两餐猪肉(来去各一餐)。日军负伤官兵从战场上抬下来,与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297页。

我军伤员一样看待。彭德怀还提出：“日本士兵喜欢洗澡，就给他们以洗澡的机会。”<sup>①</sup>李达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书中回忆说：“1942年2月，日军三十六师团工兵三十六联队士兵斋藤米藏奉命携带毒药假装投降我军，以伺机暗害我军负责同志。我们发觉以后，对这名士兵仍以宽大为怀，原谅他为法西斯军官所愚弄，视其为受害者，这名士兵非常感动，参加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积极地进行反战宣传活动。”<sup>②</sup>一些几擒几释的士兵举枪投降后，“感谢我军释放俘虏的美德”。<sup>③</sup>这些作法引起了日军的害怕，他们认为：“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就是优待和释放俘虏。”<sup>④</sup>为加强对日军俘虏的改造工作，延安还创办了工农学校，其它根据地也有类似性质的训练班。1939年11月7日，在山西省林县麻田村的八路军总部，由30多名日俘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随后又有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等组织诞生。这些组织通过出刊物、办广播、写标语、印传单、喊话、送书信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反战宣传，对于分化、动摇日本军队士气发挥了作用。1942年8月，各地反战团体派代表到延安参加了华北反战团体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大会，通过了《日本士兵要求书》、《抗议日本军部暴行宣言》。这两个大会对华北反战运动的开展，对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十队)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594页。

② 李达著：《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8页。

③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34页。

④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455页。